

此图把自先秦至清末这约 2500 年的中医药发展历程分为创建、成长、成熟、突破 4 个时期，每一时期有很明显的标志性事件或医家著作作为起点或转折点，反映的就是古人对人体疾病与健康的认识从无到有、不断提高深化的过程。

中医发展的规律因此就是一个不断完善进步的过程，有起点但没有“历史的终结”，而是必然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不断变化更新的需要继续发展。清末以后，中医药发展进入以张锡纯为代表人物的“中西汇通期”；到新中国成立后，进入现代发展期。到 21 世纪 20 年代的今天，中国社会更进入全面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我们相信，这将以科研主导中医发展的时期；因此，如何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完成发轫于文化哲理的中医药向科技引领的转型，是这个时代所有中医人的使命。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在此转型过程中，从文化哲理中孕育起来的中医药需要面对的一些制约和可能的突破途径。

1.2.2 传统三哲理背后的逻辑思维内核

传统三哲理贯穿中国社会的整个封建时代，自汉朝起就被赋予“天下之至理”的地位。但自明末开始，西方科技崛起，加上中国封建社会在清王朝后期开始解体，国人开始“仰视”西方，到上世纪五四之时达到顶峰。当其时，全盘西化思潮弥漫，文化自信降至最低点，最有代表性的莫如国学大师梁启超所说，阴阳五行说是中国“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这可说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共识。

当时的学者很容易从西方思维的视角看待中华传统哲理，如郭沫若曾著文说：

“所谓水、火、金、木、土，这是自然界的五大元素，大约宇宙中万事万物就是由这五大元素所演化出来的。……这些分化的理论虽然很武断、很幼稚，但它的着眼是在说明：宇宙中万事万物由分析与化合的作用演进而成。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五行和印度、希腊的四大说（水、火、风、土）相似，是科学方法的起源，我们不能因为它本身的幼稚与后人附会便一概抹杀。”^[9]

郭的这段话，是意图借用现代人的思维去解读中国古人的想法。不过，即使是这样，句中的“元素”，实际上也不是现代的元素概念，故只能说是借用。严

格地说，无论中外，当时（约公元前 500 年）根本不存在支撑现代人元素概念的技术条件。但往后的发展却明显是两条不同的路向：西方在摆脱宗教的控制后，以文艺复兴为起点，向现代元素概念所需要的技术条件发展；而中华传统思维则止步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类思辨性解释，而对“如何生”的问题始终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兴趣。譬如在先秦的文献里，唯一找到稍具元素意念的一句话来自西周末的史伯^[10]：

“和实生物，同则不济，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

其实，传统的五行学说，自始至终关注的是五种力量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万物如何由它们构成。在古代技术不具备解答元素如何组成万物问题的条件下，中国古人对如何构成的问题没有多大兴趣，可说也是中国人理性现实的民族性格之表现。

也许是受到郭的影响，从那时起，五行一般被翻译成 5-element theory，可说是从一开始就把五行置于元素说的框架下。虽然这样做或可因西方熟悉元素说而有助于向外国人解说，但严格来说却是一种误导，而且不仅误导了外国人，还误导了中国人自己！

长期以来，三哲理是所有传统术数应用（如所谓“山医卜命相”的五术）的理论依据。对三哲理在推动中医发展的历程中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历代中医人固然是深信不疑；虽然除中医以外的大部分其他术，在现代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中医理论由哲理主导这一观念，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民众心中，基本上都没有很大改变。

我们认为，坚持用阴阳五行等传统哲理解释中医，不利于中医融入现代社会，因为即使在中国，阴阳五行早已不是整个社会的主导思想，一般中小学甚至大学教育也没有多少这方面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因为事实上没有这个需要。但另一方面，回顾历史，中国自汉代起就曾长时间、多次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领先世界。

我们深信，要能领先世界，靠的是知识和努力；而知识的产生和积累，靠的是思维能力。一个能长期领先世界的民族，其思维模式不可能长期处于封闭迷信的状态。因此，在强调文化自信，民族复兴，走向世界的新时代，我们迫切需要对传统哲理与中医理论的关系有一个新的叙事方式或主线。

我们认为，应该把传统三哲理视为中华民族在认识世界过程中产生的、有着不同起源和思维角色的3个成果，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逻辑思维内核；这个内核有一条主线，即《系辞》所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因为历来讲《易》者对《周易》的文词有许多不同解释，而我们把这句话视为逻辑思维内核主线的概括表达，故有必要先对这句话从逻辑思维的角度解释一下。

首先，按文章标题算，《易传》有7篇，也称十翼，因为这7篇文章中，首3篇《彖传》《象》和《系辞》分为上下篇，合共有10篇之故。分上下的3篇中，首2篇每段都与64卦的其中之一有对应关系，明显是用来解卦的。但《系辞》却不是，尤其是上篇，基本上是把整个《易经》作为一个整体去讨论，故在《易经》的义理化进程中，这篇文章可说是扮演了近乎主角的角色。

其次，这句话中的“形而上”怎么解读，历来众说纷纭【按，近代对所谓“形而上学”的批判，其中“形而上”几个字即源于此】。反倒是当它被用于翻译亚里士多德的meta-physics时得到最准确的解读。“meta”的意思是指[某种东西]“之上”（譬如手写网页代码的工程师，应该都知道meta-language一语），physics指物体形状，合起来就是某种形体之上[的东西]。“形而上”作为动词，用今天的语言讲就是“抽象”的意思，故上半句话的意思即是：从物体和事象之“形”中抽象出来的，叫事物的规律或原理。《系辞》那下半句话中“形而下”之形，指的应是道之形而不是事象之形；而西方似乎直到近、现代才有对应的概念。总之，《系辞》这句话，我们视之为对逻辑思维本质的高度概括。

原理或规律性认识产生于对事象的抽象——以今天的眼光看，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句话平平无奇。我们需要回到二千多年前，根据那时的思维抽象能力作为背景来理解它在当时所具的意义。第一，甲骨文里并无“道”字，但到孔、老的春

秋时代，道却是儒道两家争夺解释权的核心概念之一。第二，那时对天道的理解，以历法应用衡量，已经接近突破，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比商代已大大提高。第三，从其形而上本质来说，抽象思维就是辨识共性的过程；如果某种共性属已经存在的概念，那表达这种共性不需要什么创新。难点却在于：如果想要表达的某种共性概念，不存在于正在作为归纳对象的事象中时，应该如何来表达这个多少有点新的概念？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创造共性新标签的过程——《系辞》上篇可以读出这样一种情况。“形而上”这句话出现在《系辞》上篇的最后一段，而文章从一开始就提到近十个“对对”：天地、乾坤、贵贱、动静、刚柔、吉凶、风雨、日月、寒暑，如何由这许多不同事象抽象得“天下之理”？在前面的1.1.2节里曾提到，从甲骨文有阳字而无阴字，直到战国之前，阴阳二字并不常用，到“一阴一阳之谓道”在此文出现，即明确用阴阳作为表达各种“对对”共性的标签，中间经历了几百年。

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指出：《系辞》这篇文章，主题固然是阴阳为易之道，但形上一形下的论述，却已超越“形而上”的结果只是阴阳作为易之道的标签这一具体认识，而是据此而上升到道即原理是来自对事象的抽象这样一个认识的高度。因此，形上为道、形下为器这句话，高度概括地表达了古人对逻辑思维本质的认识：通过对事象的抽象达到规律或原理的认识，又把原理通过落实成“器”，应用到实践中去。

有了以上关于三哲理与逻辑思维关系的背景了解，现在可以以此视角重新审视三哲理，把它们的一些特征放在一起比较（见下表）：

哲理	起点	形而上 - 形而下						思维		
		事象	目标	抓手	成果	工具	形上-形下	突破/创新	角色	意义
天人	原始社会	日月星辰	天理、天道	28宿、北斗日月五星运行	历法	圭表	自然发生	28宿+天极	参照系	规律意识萌芽
阴阳	奴隶社会（商代）	重要事情	吉凶预测	易经的义理化	易传	爻卦	自觉-首次	龟卜→筮占	二分法	抽象结果标签
五行	封建社会（战国）	万事万物	事物间相互作用	知域分类下的运算规则	阴阳五行化天道、儒学	式盘、五术	自觉	筮占→运算	模型、系统雏形	分类、系统框架

表 1.1 从逻辑思维视角比较传统三哲理。

上表突出了三哲理一方面起源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又在思维能力上扮演着从相对简单到高级复杂的角色。特别是，在“形上一形下”一栏可以看到，《系辞》关于“形上为道”的总结是个关键的转折点，在这之前，作为思维能力最初的天道应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实际上是处于自在或自发的阶段；但到筮占取代龟卜且通过义理化达到这个思维规律认识上的飞跃以后，古人已经进入自觉运用这一规律的阶段，五行生克学说从五行概念的进化，可说是达到此一思维能力飞跃后，继阴阳哲理而产生的第二个成果。

总之，我们在这里提出一个新的叙事主线：即既基于三哲理的具体内涵，但又超越三哲理的表象，看到它们背后之逻辑思维实质和演化历程。我们相信，这应能较有效地应对前面提出的一些问题。

譬如说，一方面，作为三哲理的逻辑思维内核的主线，“形上一形下”的表述并无根本性的“硬伤”，至今仍然有用。故在西方科技崛起之前，它们的整合应用确实有其积极先进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阴阳五行本身存在一些内在的制约，远没达到“至理”的高度。而且，从现代的观点看，“形而上”只是抽象一词的古代表达，本身并不能保证或确定对象信息的真实准确全面，即如所谓 GIGO（垃圾进、垃圾出）所想表达的那样：如果信息不实，所得出的结果就如垃圾一样。其次，即使对象信息真实准确全面，也不能保证由此产生的、作为抽象结果之原理必定正确无误。而正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对传统思维所作的两大关键改造——“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把这两个潜在的漏洞都堵住了，使得仍然植根于传统文化思维的中国，能在短短几十年间迅速追上时代，走上势不可挡的复兴之路。

对于中医理论来说，哲理主导的说法虽非毫无根据，但这只是表象；用本节提出的、以哲理背后的逻辑思维去重新检视中医理论，则不难发现，中医理论更真实的来源，正是基于对生活经验的逻辑思辨；本书对中医理论的创新论述，即是建立在这一认知的基础上。